

麦克斯·阿德勒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局限

车 轅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麦克斯·阿德勒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其思想延续了新康德主义者的主张,认为社会存在集中表现在社会文化之中,并将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用康德的先验结构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阿德勒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从“社会性”这个先验前提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但其将“经济关系”等都归为“精神关系”,将社会存在“精神化”,过分夸大了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对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理解,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歪曲解读。

关键词:麦克斯·阿德勒;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社会性;先验;精神化;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3-0054-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3.008

Max Adler's Marxism View and Its Limitation

Che Yua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ustrian Marxists, Max Adler's ideas continue the neo-Kantism that social existence is concentrated in social culture. He combined Kant philosophy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nterpreted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ism, thus trying to explain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in terms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 He also opposed bourgeois individualism, but understood socialism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premise of "sociality". However, it's an overstatement of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at he classified "economic relation" as "spiritual relation" and "spiritualized" social existenc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and exis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 which is a distorted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Max Adler; Marxism; neo-Kantism; sociality; a priori; spiritualization; socialism

麦克斯·阿德勒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性人物。1904年至1938年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奥地利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要源于对修正主义的反对。它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和哲学前提的修正,通过将其研究结论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发现进行对比而实现。这一过程不仅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得以与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也使得他们能够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

收稿日期:2022-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ZZ020)

作者简介:车 轅(1987-),男,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点和局限性。维也纳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各种学派之间的共同点,甚至是密切联系欧洲的社会和哲学思想来提出自己的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引用康德的批判哲学来支持这些解释的基本合理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目标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认识基础。麦克斯·阿德勒选择了反自然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立场,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与伦理哲学相结合会更有说服力。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与康德哲学相关的概念和主题,比如社会科学的先验性、先验的社会基础、社会化、知识论等。然而,我们需要批判地看待阿德勒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毕竟它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一、康德先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化”概念

阿德勒在理论研究过程中思考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个体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从康德那里继承了这个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表达,这种政治表达依赖于与康德思想相关的知识原理和社会心理学原理。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及知识学家,阿德勒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他澄清了实现人类潜能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的起源;二是作为一个知识学家,他为社会话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种社会话语是为了个人的判断而设置的。阿德勒试图在对社会经验更深的意识基础上为社会生活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根基。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范畴和康德的先验形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都可以成为组织经验世界中事件的连结。简单地说,价值就是人际关系社会化的经济表现,尤其是由于价值是依赖于它的表达方式的抽象概念,各种商品的交换

价值,构成了它们的基础。就像康德的“我思”(I think)是一种非个人的形式一样,阿德勒通过对康德“先验统觉”的扩展性使用,认为其中包含着每一个可能经验的形式,不管是逻辑的、伦理的、美学的,还是宗教的。因此,阿德勒将所有文化都纳入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框架之中,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同时提出了“社会性”这个关键概念。阿德勒认为,社会性是经验的先验条件,这些经验包括时间、空间以及康德知识论中的范畴。人类生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只有当我们认为共生的、合作的社会生活形式是可能的时候,政治意识才能发生。在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性这个概念是一种先天的概念,是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理解的前提。在《康德与马克思主义》(*Kant und der Marxismus*)一书中,阿德勒指出,“实际上,我们必须像批判哲学那样,从个体意识出发进行研究,但是还需要在这种个体意识中展示出一种超个体的、先验社会的和先天社会化的特征。所以,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出发的,但是,这里作为研究起点的人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社会化的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显现出来,因为个人只有在人类之中才具有经验上的可能性。”^[1]

文化思想和行动的相互作用拓宽了一个人的立场,使其能够以新的视角看待对立的观点并解决分歧。除了人类,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历史是人类在相互对抗势力的冲突之中,创造、再创造社会组织,以接受对抗势力不同视野的辩证行动。因此,辩证法本身就是思想家可以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世界中的对立力量,因此才需要提高人的辩证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够识别社会世界复杂的思想 and 事物,并找到一种逻辑,将它们联系到一个带来进步而不是冲突的社会结构之中。进步,是一种对所有共享某个社会世界的人来说更健康的一种社会状态。人们不能教条式地运用教科书上

的逻辑,世界的真实经验必须以现象学提供的洞察力来探究。在阿德勒看来,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尝试,试图通过回归整体意识的生活经验来超越仅仅是逻辑思维的局限性。换句话说,人们迫切地寻求与他人的“亲和性”。这种欲望激发了一种强烈需求,即避免因不遵守和同意现有的法律、道德和规则、习俗——所谓的“类型”——而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人们所深信的意志是普遍存在的,在他们的社会中,这个过程被称为“社会化”。

阿德勒这种理论主张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现实与政治原因。在 1918 年和 1919 年,议会共和国的理念遍及整个奥地利,这种理念在最开始的时候指引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阿德勒不仅是开辟这条道路的理论家,同时还投身于实践,在 1918—1919 年则担任了维也纳第八区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论社会学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区别》(*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the Juristic Method*)一书中,阿德勒指出,社会主义的极端左翼支持议会的理念作为国家的一种形式,它是当地议会通过民主产生出来的,选出的人在更高级别的层面来代表当地议会,一步步上升,最终成为国家代表^[2]。阿德勒对于议会运动的理解建立在自下而上的联合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基础之上,由此,他提出了“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概念。这也是一种社会形式,这种形式让人们意识到所有个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合作的行为对于形成一个社会是必需的,这对标志着资产阶级国家民主理念的个人主义的前提构成了挑战。阿德勒分析了这种不同,他认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破坏了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只能通过共同的利益和效果来达成。

阿德勒将自己视为一名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激进主义分子的宣传者,他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论前提,深入研究当时社会问题的

表现和原因。阿德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社会学的先驱,将“国家”理解为一个变化着的制度上的现实,这种现实是其成员之间持续变化着的关系的表现。他强调,一种社会学的方法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关注的是人们价值和行为不断变化着的内容以及群体之间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经济上的统治,这种统治会引起二者之间的阶级斗争。阿德勒建立了社会变化和教育变化之间的联系,当他谈到这一事实时,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无序和缺乏文化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改善旧的状况和制度来解决。相反,他认为,这只能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实现,然而,这需要新的人“不能被旧的教养和教育方式所征服”。

阿德勒将康德先验哲学与整个社会文化结合的方法并不是其独创的,而是受到先前哲学家的影响。比如,柯亨就认为先验方法是从“存在着的文化事实”开始的,先验的观点(Gesichtspunkt)并不只是关涉理论哲学或者道德哲学中的问题,也关涉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相关的系统问题,于是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文化构成了世界,即对先验方法来说问题的集合体。”^[3]而这种方法也得到同时代很多哲学家的赞同,如卡西尔在 1936 年题为《作为文化哲学的批判主义》的演讲稿中写道:“康德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对逻辑、科学、伦理及美学思想的特殊形式的探究,只要不改变它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思维、判断、认识、理解,或者是感觉,人类试图通过这些形式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总览,这样一种综合的观点,在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和科学中都是有关系的。”^[4]阿德勒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研究,以此来揭示先天的社会层面。他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错误,总认为他们抛弃了康德关于人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en)本质的概念,拒绝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探究人类的现实。他指出,

在心理学上,人类展现出追求统一性的生活目的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中都能够找到这种对于统一性的追求,无论是在逻辑学、伦理学还是美学上,即思想、意愿和享受的活动中,都存在着这种先验的统一性。

阿德勒也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去寻找自己的理论根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艺术精神的、宗教的精神、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5](P701-702)}所以,在阿德勒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是知识论的。他认为,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获得思维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取无限复杂事件形式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他批判工作的重点是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这种分析方式成为了理论经济学中关于资本的一个伟大的新观点,因此它成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康德意义上的“批判”一词。

二、阿德勒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家的观点

阿德勒指出,社会主义基本上不是一种工人运动,而是一种文化运动,这种文化运动包含着社会主义通过将工人阶级发动起来以实现文化,它将文化和工人推动到现在的水平且将一直推动下去。所以,社会主义对于阿德勒来说,是文化上的,是与工人阶级相关的。阿德勒认为,工人阶级是在社会主义中认识到这种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是人们本质上

朝向统一性倾向的实现,这种统一性表现为“统一与和谐”(Einheit und Harmonie)。阿德勒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代表的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实,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资本主义批判与康德的自由哲学相结合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子化”倾向。因为,马克思说过:“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5](P207)}马克思也强调,“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P684)}社会不仅仅是众多鲁滨逊意义上个人的集合,民主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康德的自由哲学,民主社会主义者总是强调针对所有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他们利用康德来宣扬“社会的个体主义”观点,反对“夸大的个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把人看作是自由、理性的个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它提倡的不是人的改进,而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民主社会主义旨在把人从资本主义创造的依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渴望彻底改变社会秩序。

社会主义如何能够成为可能?这类似于康德所提出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是阿德勒试图赋予这个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因此,在阿德勒看来,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形式上的,与康德哲学相关;另一个是情境性的,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化的人的理论相关。阿德勒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即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一个统一的社会。社会主义虽然也表现为文化的意识形态,但阿德勒却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素”具有两种内涵:一方面,它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一个中性概念,因此涉及的是人类本质以及朝向统一和谐的运动,这是在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表明了阿德勒反对把社会中文化的实现条件看作是无阶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

阶级不能允许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解读的。由此,阿德勒指出,个人内在的社会性是通过不同的历史和经济力量所塑造的,只有通过民主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才有可能将内在的社会性变为真正的自由,即摆脱了等级、支配和剥削的自由社会,这种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方法被用来指引朝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

阿德勒用对抗性的概念把康德的思想 and 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他详细引用了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命题四中的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成为了阶级冲突的理由以及他的先验社会概念的基础。对于这个观点,康德是这样描述的:“在这里,我把这种对立理解为人们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们进入社会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却与不断威胁要分裂这个社会的一种普遍对抗结合在一起。这方面的禀赋显然蕴含在人性之中。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偏好,因为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说,感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他也有一种使自己个别化(孤立化)的强烈倾向,因为他从自身也发现了非社会的属性,亦即想仅仅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置一切,并且因此而到处遇到对抗,就像他从自身得知,他在自己这方面喜欢对抗别人一样。”^[6]在这里,康德认为,人们为了充分感受自己的人类能力而与他人交往,同时又为了了解自己的心意和意志而退缩,这是一种人类学规律。通过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人们对生活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超越自身的想法和现实。与他人的接触可以检验一个人的想法,而经验使一个人的视野得以矫正。康德指出,自然在人类内部建构一种接近一回避的辩证法是有计划的,而这个计划是为了驱使人们通过自身的鞭策创造不断运动和变化来发展他们的全部能力。阿德勒在给出了康德上述观点之后指出,这种必然使个人联系在一起但又相互矛盾与对立,是马克思在每个历史时期所看

到的社会阶级斗争的核心。在康德的历史哲学理论中,人们对于自己的同伙可以“无法忍受”,但不能“离开”。因此,阿德勒认为,社会经济世界的结构证明了那些争执不休的人们的相互联系,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聚集在一起谋生,康德和马克思都认为历史是一种迈向更公平、更广泛的共享的利益社会进程,这种进步使得社会中大多数人能够获得面对共同困境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

阿德勒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论社会学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区别》一书中区分了社会民主党创造一个“社会民主国家”的目标和当时资产阶级创造“政治民主国家”的目标,前者的根基在于社会团体共同普遍的意志;后者的基础是掌控生产方式的人的意志。“政治民主国家”体系构建的根基在于个人竞争,而非对于相互依赖关系的意识。因此,他认为,即使马克思提出了国家的消亡,但是未来依然存在着国家,只不过这个国家是一个社会的国家,而非政治的国家。它的产生是通过拥有共同生产方式的全体人民的互相承认,而不是通过少部分具有支配所有权及其社会财富的人的自我保护。由于人们之间的差异性,维持有效的公共政策虽然确实需要强制力,但是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在社会民主国家共同支持的普遍基础范围内的,阿德勒称之为一个“团结的社会”的一般意志。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政府不再是对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对自身事务的监管。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一段话:“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7]对此,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进行了详细阐释:“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希望消亡的国家不是作为中央管理机构的国家。因为任何现代的文化都需要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会继续存在。马克思所希望消亡的国家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就像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那样,共产主义下的公共权力会失去它的政治属性。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坚持只有在去除政治属性的意义上国家才能够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需要消除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意图巩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对社会其它阶级的支配。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像国家公园和驾驶考试中心这样的公共管理机构依旧会存在。”^[8]这段话也充分表现了以阿德勒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定位和理解。

三、阿德勒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局限性

阿德勒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实际上是通过将唯物主义定义为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一部分,以此来回答存在的本质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不仅将自己的理论与自然科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区分开来,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引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段话:“在那个绝对本质的问题上,启蒙自己同自己争执……并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把那个无谓语的绝对物称为……最高的绝对本质……另一派则把它称为物质……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解释的出发点不同。”^{[9](P336)}马克思对于这段话的引用,指出了形而上学的理念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共同根源,同时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两种观点的拒斥态度。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过精神存在的现实性,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实在论”或“实证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在感性上

是真实的,物质的现实性不仅仅存在于意识之中。马克思是个唯物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意识被承认是物质的一个方面以及存在的一个方面,物质是有意识的存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P152)}可见,阿德勒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质。

阿德勒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关系的人类化”,他引用了考茨基的说法:如果你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在没有人类思维活动的情况下向前迈出最小的一步,那么你必定对经济发展有一个近乎神秘的想法。如果没有“有意识的人类精神的干预”,经济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在这一点上,阿德勒认同马克思对于意识与存在问题的人道主义解决方式,同时也体现出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同点。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在《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与批判的研究》一书中写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自己“正在努力实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正综合,以考虑康德的批判”^[10]。但是阿德勒的康德式的、批判的理念论的观点使他无法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不得不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划上一道分界线。阿德勒认为,既然经济关系是人类关系,那么它们也同样是“精神关系”,即思维之间的关系(geistige Verhältnisse),而且它们仅仅是思维关系,他认为经济像意识形态一样,是思维的某种东西,即思维的另一种形式。

阿德勒将社会存在“精神化”(vergeistigen),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社会存在不仅仅是事物的自然存在。马克思的“意识”一开始就被置入社会进程中而不是简单的自然进程中,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标而行动,这种社会进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从这个正确的前提出发,阿德勒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意识不能被任何与之相异的东西所决定,因为社会存在是精神性的某种东西。阿德勒认为,通过反思,“真理”的概念

以知识的形式获得了其真实的表达形式,所有的历史真理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在反思性知识所建立的基础上,历史“真理”的命名才成为可能。在一切变化的历史中,意识的构成和自我确立的规律,即思想的必然性,是历史真理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真理的概念无条件地确立了所有表达历史真理的判断价值,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构成世界观的实践概念^[11]。这个结论使得阿德勒坚持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认为二者处于精神的一致性之中,从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就像雅库博夫斯基总结的那样,对于阿德勒来说,他不能理解革命的、实践的、批判的活动意义^[12]。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3](P114)}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P135-136)} 所以,马克思进行的是以社会生活作为社会实践的、从自身内部进行阐释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实现了对过去和未来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明确反对将社会存在抽象为“精神性的”,在《神圣家族》中他就写道:“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9](P273)} 因此,社会存在在第一性意义上绝不是精神性的。

在评价费尔巴哈的时候,阿德勒甚至不认为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费尔巴哈指出的存在不是单方面从物质开始的,总是在强调人们之中理念和物质相统一。阿德勒给费

尔巴哈的哲学贴上了“实证主义”的标签,认为其哲学将自身限制在对所给与的感性材料进行概念阐释和综合的范围内,是为了获得能够被称为真实的知识。而这明显是对费尔巴哈的歪曲解读,费尔巴哈明确提出思维源于存在,而不是存在源于思维。虽然费尔巴哈也认为存在与思维具有同一性,但他强调的是思维的来源是在真实的、生活着的人的头脑中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德勒为了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不惜对一些文本作出曲解。

在社会学的视角之下,阿德勒明确地把工人阶级政党的具体角色降低为一个主要的消极因素。阿德勒没有看到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直接行动和革命行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工具,让社会民主党的先进阶层理解文化、经济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认为这样就可以指导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走上最人道的社会发展道路。相比之下,列宁更加强调行动在革命意识形成中的首要作用。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中的行动可以产生阶级意识,被动等待会导致投降和默认。同样,革命行动是革命意识的直接外化,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革命实践中,它同时要求和形成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机械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意识上的决裂。当千百万人民参与革命行动时,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实现。这是因为抽象的“政治权利”被转化成了实际的阶级权力和力量。当阿德勒等待着从资本矛盾的抽象中出现一种更纯粹的民主形式时,列宁已经从所面对的严峻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现实中,清楚地认识到在民主的矛盾中存在压迫的工具,这种工具使工人阶级同意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民主实际上就是少数人用来征服绝大多数人的工具。因此,革命行动必然成为生死攸关的决定的行动,而不是一场等待的游戏。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人口上得到发展,在技术和经济上有了巨大进步,教育机会不断扩大,但是我们也同样看

到所谓西方“民主”社会充斥着垄断资本、新自由主义逻辑、腐朽和商品化的文化价值观、信息的媒介化和整合,而空洞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弥漫到日益腐败的公共生活和狭隘的公民社会,这些都标志着阿德勒意义上的改革理论在客观现实中的失败。如果没有现实力量的参与和斗争,我们就不会看到任何有意义的或制度上的变化。这一点正是阿德勒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所在,就像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判。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果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雇佣工人用‘磨洋工’的方式对抗生产,用罢工和捣毁机械的方式争取成果共享,用政治斗争的形式夺取国家政权,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保证成果共享。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阶级斗争直接推动了社会发展,阶级斗争与成果共享的程度密切相关。”^[14]

麦克斯·阿德勒是寻求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知识批判”基础上的代表之一。他对列宁和考茨基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认识到,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版本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其对象是社会,而不是自然。阿德勒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来理解并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他深受科学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思想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的影响,并借用了康德的理性概念,将统一性和公共性作为社会和文化的的前提,以及社会发展所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注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反对旧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阿德勒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阿德勒过分强调康德的先验观

念,甚至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为精神关系,没有看到社会实践作为现实性前提的根本性地位,最终导致其理论依旧是唯心的、主观的和片面的,因而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Max Adler, Kant und der Marxismus [M]. Berlin: E. Laub'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25: 138.
- [2] Max Adler,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the Juristic Method [M]. Leiden: Brill, 2019: 121.
- [3] Hermann Cohen, Kants Begründung der Ästhetik [M]. Berlin: Dümmler, 1889: 344.
- [4] Ernst Cassirer, Symbol, Myth and Culture; Essays and Lectures of Ernst Cassirer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64-91.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7-2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71.
- [8]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7.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252.
- [11] Max Adler, Kausalität und Teleologie im Streite um die Wissenschaft [M].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Vorwärts, 1904: 201-222.
- [12] Franz Jakubowski, Ideology and Superstructur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 New York: St. Martin's, 1976: 3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蒋显荣,侯彭振.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动力认识的原发性贡献[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46-54.